

救国愿望的朋友共同研究学问,寻找救国真理,探索中国的出路。而当他从西医书院毕业后,决计“借医术为入世之媒”,在行医中积极结识一批对清政府不满的爱国青年和会党分子,一起议论时政,开始了挽救民族危机的政治活动。

1894年1月底,孙中山专程返乡,闭门十多天,草拟出建议改良政治、谋求民富国强的一封长达八千多字的信——《上李鸿章书》,又和陈少白商讨修改定稿。他在翠亨村期间,潜心谋求救国之道,根本顾不上夫妻间的儿女情长,可卢慕贞从不埋怨,在生活上给予悉心照顾,在感情上又以妻子独有的温柔去体贴。每次孙中山匆匆离别家乡,卢慕贞总是默默为他打点行装,望着丈夫远去的身影,她总是把惆怅和思念深深地埋在心中。

1894年11月,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,树起反清革命的大旗,昂首踏上了民主革命的征程。在这一漫长的革命岁月中,卢慕贞以她独特的方式给予丈夫默默的支持。可以想见,孙中山长年累月在海内外奔走革命,根本难以顾及家庭,而他的大哥孙眉又远在檀香山,姐姐也已出嫁,年迈的母亲杨太夫人身边只有大媳妇谭氏和卢慕贞为伴。在这种情况下,卢慕贞默默地承受着家庭生活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。每当漂泊在外的孙中山向来自家乡的人打听家况时,他们一致称赞卢慕贞的美德。在当时,乡人谓卢慕贞“孝敬贤淑,闻于乡党”,这使得孙中山没有后顾之忧,更加全力以赴地投身革命。

携儿带女 亡命檀香山

1895年,孙中山和陆皓东先后在家乡石门、南荫招募勇士,策划在广州武装起义。同年10月26日,孙中山组织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——广州起义还没有正式发动就被清政府镇压了。结果反清义士陆皓东、朱贵全等被捕后,慷慨就义;孙中山流亡日

本。从此，直到辛亥革命成功，前后有16年之久，孙中山一直流亡在海外，为反清革命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。

关于卢慕贞携儿带女亡命檀香山，长期以来流传着这样一个惊险的故事：

广州起义失败后，清政府疯狂缉捕革命党人，广州城内外及南海、番禺等各县，遍贴两广总督谭钟麟缉捕革命党人的告示，并分别悬赏花红银一千或数百元，通缉孙中山、杨衢云、郑士良等革命党首领。其中广东按察使兼管全省驿传事务衙门悬赏逃犯的告示云：“孙文即逸仙，香山县东乡翠微人，额角不宽，年约二十九岁。花红银一千元。”可孙中山已于10月27日深夜乘船逃出广州，经香山唐家湾到澳门，来不及返家向老母、妻子和儿女道别，即于29日抵香港；11月2日因遭港英政府驱逐而离开香港前往日本。

孙中山被清政府列为叛逆的要犯，家属自然受到株连，香山知县史继泽迅即派人到翠亨村捕拿他的家人。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翠亨村，卢慕贞和婆婆杨太夫人闻讯手足无措，立即收拾细软，准备逃难，但一家老少究竟逃到哪里去呢？几位妇道人家一时没了主意。或许苍天保佑卢慕贞他们，清政府官署书吏将孙中山家乡翠亨村误写为翠微村。翠微村是个大乡，在翠亨村之南30公里，而翠亨当时是一个很偏僻的小村。官署书吏的一字之差，使得卢慕贞一家有时间逃过一场大劫难。

当大批清政府官兵凶神恶煞地赶到翠微村抓人时，该村村民说村里根本没有姓孙的，翠亨村才有姓孙的。于是，他们又急忙赶到翠亨村，果然轻易找到了孙家。卢慕贞和杨太夫人闻知情况危急，赶紧四处张罗，终于借了数十金，拱手奉送给那帮贪婪的官兵，并说了无数的好话，结果官兵在拿到钱后就吆喝一番走了，回报翠微村查无孙姓，交差了事。

后来得知，翠亨村与翠微村的一字之差，其实并非官署书吏误写，据台湾学者庄政教授认为：“广州事败，陆皓东等被捕，在所书供状中，讹称家居翠微村，实则其与中山先生为翠亨村邻居，但为避免连累孙、陆两府家人，故行‘权宜之计’，清吏可能根据陆之供状出此。”

卢慕贞一家虽然侥幸逃过劫难，但清政府把孙中山视作叛逆要犯，岂肯轻易放过

他的家人，所以，如果不远走高飞，势必凶多吉少，不知哪一天会灾祸临头。正当他们整日为逃难的事犯愁时，正巧陆皓东的侄儿、兴中会会员陆灿从檀香山返乡结婚，当他了解到险情后，自告奋勇，帮助护送卢慕贞携带5岁的儿子孙科和襁褓中的女儿孙妮，与杨太夫人、孙眉妻子谭氏，先逃到香港，获革命党人陈少白的资助，再乘轮船远涉重洋前往檀香山，投奔在茂宜岛经商的大伯孙眉。

然而，上述关于卢慕贞携儿带女逃亡檀香山一事，陆灿的回忆有前后两种矛盾的说法，一是如上所述是在广州起义失败后从故乡逃脱清廷的追捕，经香港逃亡檀香山；另一说是讲孙中山在发动广州起义前就意识到一旦失败会危及家庭，所以在起义前就让家人搬到香港居住，因而卢慕贞一行是从香港逃往檀香山的。陆灿在《我所认识的孙逸仙——童年朋友陆灿的回忆》一书（黄健敏译、欧冬红校）说得非常清楚，早在起义前“孙博士把家里人都送到香港藏起来了”，“孙家在知道起义的消息时早就已经跑到香港去了”。陆灿还回忆了他当年受叔公（陆皓东叔叔陆星甫）即村中的长老的委托，跑到邻村去拜访当官的舅公，求教如何应付奉命前来搜查缉捕的官兵。结果是到来的官兵心不在焉，在收了“报酬”后，让陆灿他们带到孙中山空无一人的家中，然后就相安无事地走了。

陆灿的回忆究竟哪种更符合真实？笔者认同孙中山研究专家、《孙眉年谱》一书作者黄健敏先生的观点，认为“广州起义前孙中山家人已先往香港当更可靠”。孙科对逃亡经历是这样回忆的：“记得1895~1896年间，祖母、母亲、我和妹妹四个人在同乡陆灿先生护送下从香港途经日本到檀香山。当时我们乘的并不是完全的汽船，称为火轮，虽然也有部分依靠机器的动力航驶，但仍兼张着帆布，船重也只有三四千吨左右，从香港首航途经日本的长崎、神户、横滨等港口，已耽误数十天，然后到火奴鲁鲁，历时共一个月。”

再说孙中山流亡日本，虽遭清政府通缉，但仍坚定不移地宣传革命，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。1895年12月中，他只身从日本来到檀香山，立即前往茂宜岛，使卢慕贞得以和遭到革命挫折的丈夫团聚。卢慕贞对孙中山四海为家、奔走革命、遭受挫折，无一言责备。虽然她不懂政治，在反清革命的宏业上与丈夫没有共同语言，更不会用动听的话语去安慰，但她懂得如何让丈夫抛却家累，毫无顾忌地投身革命。当孙中山

看到一家老小安然无恙,对卢慕贞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。

孙中山在茂宜岛家中小住,旋而辞别妻子、母亲等,赶往檀香山正埠。此后他时常回家和家人团聚,但为了便于进行革命活动,在正埠居留的时间比较多。

1896年6月,孙中山因革命工作不宜久留檀香山,毅然辞别家人赴欧洲进行革命宣传。

1896年10月,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清廷驻英公使囚禁,九死一生,获释后不久的11月12日,他在伦敦度过了他而立之年的生日。就在这一天,他和卢慕贞短暂团聚的结晶——次女孙婉在檀香山降临人世。女儿与父同月同日出生,洵属奇事,饶富意趣。孙婉的出生,给孙家带来了吉祥和喜庆的气氛。可远在英国伦敦的孙中山,为了国家和民族,却无法享受喜得千金的无穷快乐。

外人不知的是,卢慕贞在分娩之际曾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。那时孙中山在伦敦蒙难的消息传来,卢慕贞为丈夫的生死担忧,寝食难安,差点以身相殉。此事足见卢慕贞对孙中山情深意长,她把丈夫的生命视为比自己更加宝贵。

卢慕贞一家在檀香山一住就是十多年,生活上全赖大伯孙眉。她除了照顾婆婆,尽可能以勤快的双手承揽家务,还悉心抚育儿女。在孙科6岁那年,文化不高的卢慕贞为儿子启蒙,教以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《幼学诗》等,还延请老师到家中讲授国学。后来,广东新会人黄瑞祥到茂宜岛设塾授课,卢慕贞让儿子拜在黄瑞祥门下。孙科扎实的国文基础,就是在这段时期里在母亲督教下获得的。此外,卢慕贞闲时不忘临摹字帖,以排遣对丈夫的思念之情。

从香港赴南洋

卢慕贞在檀香山一住就是12年,其间孙中山仅三次赴檀香山与卢慕贞团聚,时间总计不超过一年半。